

January 1934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續)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續)。《嶺南學報》，3(3)，108-123。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9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七章

南方對於西化的貢獻

因東西航道的直接溝通，而引起歐人之東來中國，及中國人之向外發展；而這種東西的接觸，又引起中國的經濟生活和宗教信仰及文化的其他方面的變動；這種經濟生活和宗教信仰，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又影響於政治上的變動。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運動之最能令人注意者，要算太平天國的政治運動，戊戌的維新運動，以及革命運動。這三種運動，雖各有其特殊之點，然也有其共同處，這就是三者都是受過西洋文化的影響，而且通通是策源於南方。

但是三十年來的革命運動的重要，人人都能見得到。而三十年前的戊戌維新，以及七十年前的太平天國，好像很少人加以相當的注意。太平天國之在滿清簡直是被人目為叛逆，烏合之衆。正史既鮮有記載，傳記也是寥寥無幾。直到近數年來，纔有些人重新把來估量，可是這種工作，還是在萌芽時代。至於戊戌維新運動在那個時候，雖是氣象萬千，天下耳目，為之一新，而為世人所注意，然三十年來，人們對之好像逐漸遺忘。這些態度，大約是由於人們每以成敗為估評歷史的價值的標準：

我們且先從太平天國說起：

太平天國的崛起的原因，說起來自然很多，然而西洋文化而尤其是宗教方面的影響，可以說是這些原因中最顯明之一。麥沾恩牧師在梁發傳裡曾有下面一段記載：

「現在讓我們來看梁發先生派送小書所生的效果。梁發和他的同事們在學院分送小書的時候，曾經把書籍一分派給一個青年

童生，這個童生的名字叫做洪秀全。洪秀全考試落榜，帶了那分基督教書籍回到他的家裡去，這件微小的事情，後來竟造成中國歷史上驚天動地的一個大變局。洪秀全落榜回家的時候，年紀只有二十歲，他起初對於梁發所派給他的書，並不注意，祇將它放在書架上，擱了九年之久。一八三七年，他再赴府試，仍舊名落孫山。考試完畢回家，不久就生起病來。他在病中見許多異象，他恍惚之中，看見一個令人起敬的老人，授給他一把斬魔劍，又看見一個自稱「長兄」的中年男子教他如何使用那劍。一八四三年某日，他坐在書房看書，忽有友人前來拜訪他，那個友人在書架上發見梁發的書，而對洪秀全說着，這才引起他對於這書的注意。當下他從書架上把那書拿出來閱讀，他讀了這書以後，就相信他已尋得解釋他所見的異象的鑰匙了。他知道那令人起敬的老人，就是上帝，而那所謂長兄者，就是耶穌基督，他悟到他所見的異象，是神的啓示，因此他就拔劍而起，從事他的革命運動，這就是太平天國之亂的來由。洪秀全同一個名叫馮雲山的友人，受了梁發的書的感動，興起打倒偶像的戰爭，組織了一個上帝會。可是他們雖有熱誠，却少知識，而他們所用的破壞手段，更難博得人們的同情。洪秀全久有意思要加入基督教會，到了一八四七年，他第三次府試落榜以後，他就定意想加入教會。他跑去拜訪美國浸信會宣教士羅孝全Roberts 牧師，他與那牧師同住了幾個月，沉潛於基督教的教訓之中。洪秀全請求那牧師爲他施洗，可是那牧師因爲洪秀全的神學觀念，有些怪誕不經，不願爲他施洗。洪秀全失望之餘，就回去創立他自己的團體；集合一些有志反抗清朝和反抗崇拜偶像的人，在他的旗幟之下。可惜後來他因戰事

上的勝利，而變壞了他的性格，他的心理發生了不平衡的狀態，他竟欲求與神天並列，可謂褻黷神明已極。他曾經採取梁發先生用文字佈道的方法，著作宣道小書，他初期所作的小書，極合於基督教的教義，其中一種叫做宗教戒律，麥都恩牧師曾說，此書可說是太平天國諸人所著作的一些書中的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當，其禱文亦佳，而其關於人類之邪惡，耶穌以血救贖人罪，及聖靈感動人心等教義之敘述，皆能引導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國。」洪秀全所組織的團體，除了分送他們自己所著作的傳道小書外，又印送新約經聖。」

這段話是一位教士說出的，而且是為要明梁發的影響的力量之大，而出這段話。他對於梁發的尊崇，及對於洪秀全的指摘和贊揚，也許有人發生疑問。然太平天國之藉基督教以號召群衆，却是很顯明的。比方湘軍誌中對於這點，也很顯明的表白出來。

「……洪秀全者，廣東花縣人也。少飲博無賴，敢為大言，組知書，賣卜為生。聞妖人朱九疇創上帝會，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秀全常詐死七日復甦，謬衆云，上帝召我有大劫，拜天則免，遂託泰西人所稱為耶穌教者，造真言寶誥，謂天曰耶和華，耶穌為長子，秀全為次子。」

太平天國不但是藉西洋教以號召天下，而且很誠懇的去實行基督教。這一段在英人林利 Lindley 所著太平天國外紀一書（孟憲承譯）說得很詳細。比方裡面有一段記載：

「每二十五家設一教堂，各家兒童每日須到教堂去讀聖書。禮拜日則人民均須祈禱，男女分坐不相混亂，官長應入禮拜堂宣講，奉犧牲祭祀，違者黜其官。」

他又記載上至官僚，下至人民，無論是日常生活，重大典禮，

閒常談話，或是嚴重演說，沒有不遵守宗教上的儀式的。此外書籍之關於這種記載的也很多。比方太平天國野史有了下面二段記載：

「太平軍於城市村莊分踞民房，屯於原野則蓋板屋，以爲營壘，率皆宏敞，以備禮拜之用。……佳時令節，壽誕生子彌月，與夫攻克城池，在軍中所爲喜慶事，則不拘常格，別備盛饌，善敬天父；其有疾病修灶等事，悉如天條中所載，奏章格式，繕寫讀訖焚化之，敬天父以祈福。」

「太平軍所據之地，動輒鳴鑼傳集兵衆，或百姓，於何日何時，齊集何處聽講道理，蓋皆有所爲也。凡刑人必講道理，募兵必講道理，倉卒行軍，臨時授令，必講道理。騙使群卒爲苦役，必講道理，逃者日多必講道理，將欲搜擄，必講道理，勸人貢獻，必講道理；總之，所謂講道理者，乃勸諭兵衆將借宗教以行之。」

太平天國既以宗教爲政治運動的中心，而這個宗教不但是在理論方面是從西洋的教義輸入過來，以號召群衆，就在實力方面，他們也想借當時正在南方增加的外國基督教勢力來幫助他們的政治運動。這一點我們可從太平天國野史所載一段話見之：

「秀全……試畢果落第，睹清政之瀾亂，官吏之貪殘，民生之困蹙，遂隱蓄革命之志。時朱九疇倡上帝會，誓以恢復明室爲志，秀全與同邑馮雲山往師之。九疇死，秀全被推爲教主，官捕之急，聞入耶教可藉以抗官，乃往香港受教於英牧師郭笠士門。」

這個時候正是鴉片戰爭敗後，中國政府以皇朝之尊，而敗於洋人，香港割讓，五口開放，聖經既可繼戰艦以宣傳，那麼能夠得到西洋教士的保護，當然可以抵抗中國的政府。同時他們之所以要反抗政府，就是因爲政治的腐敗，這一點秀全在其建國時的檄文裡說得

很清楚：

「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君人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至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訟惡不究，貧賤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指髮！卽以錢糧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前之糧，今且復征，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州府縣之賊官狼吏，盡行誅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

原來歐洲十六七世紀間，君主專制，人民塗炭，所謂耶穌會的教士，每藉天主上帝救民於水火的口號，以反抗君主。利瑪竇既免不了這種背景，而他到中國以後，雖見得在中國的政治勢力太大，不得不從事曲就。然天主教義明明白白說明上帝比人君天子爲高爲大，所以天子或人君之不德者，人民可以承天主之意而反抗之。我們試閱太平天國各種宣傳著作，如三字經，如原道醒世訓，通通以上帝爲至尊無上的。人民固要服從，君主也要服從。所以他們之反抗政府檄文裡，劈頭就說是「奉天承運。」我們於此可以明白太平天國的宗教氣味的濃厚：

有些人說太平天國之崛起主要原因，是覆清復明，和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但是所謂覆清復明，清稗類抄述有秀全一段話：

「洪秀全常語人曰：三合會之目的，在覆清復明，其創在康熙時，主義雖正，當然必至二百年後如今日始可爲覆清之舉。至於復明則又似是而非，既還復我固有之山河，必當建立新朝廷，今乃以復明爲言，焉可得人心？就吾真教言之，全賴上帝會之威力爲援助耳，其得助多已，以吾等數人敵彼百萬可也，吾

是以不知有孫臏吳起孔明各名將，三合會果有何價值哉！」

使此言真由秀全所出，則世人所謂太平天國之崛起乃在覆清復明之說，不攻而自破。至於種族革命的思想，在各檄文裡雖處處流露，然照我看起來，也不外是藉以引起漢人反對滿清政府的一種手段，似不能算作主要原因。原來秀全在滿清統治之下的考試制度，竟連試到三次之多，其希望名登榜籍，而効忠於清廷的思想，可以概見。若說是種族革命的觀念深入了他的頭腦，好像不大妥當。此外我們試看楊秀清韋昌輝們致漢人充清官吏的檄文，還能找出其濃厚的宗教色彩：

「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甘為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為之矧，而甘為之用；是則令人言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為滿所用，本係被其脅迫，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茲者三七之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勛。」

可知種族之興起與滅亡，依賴於天主的意旨，這又是以宗教為種族革命的中心的明證了。

不但如此，歐洲的反抗專制君主的運動，既像上面所說，得力不少於耶穌教的政治思想，而歐洲的民族主義的發展，又得力不少於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目的是欲推翻教皇的壟斷個人信仰，而使個人直

接認識上帝，然其背景和結果，則是民族主義的勃興。這種民族主義和新教運動的密切關係，是隨處可見的。新教之最初傳入中國而受信仰舊教的拉丁民族的排斥，雖可以說是有了經濟的背景，然民族的背景，似也不能蔑視。太平天國的掘起，假使果以民族主義來號召民衆，則這種民族主義而受過西方民族主義的多少影響，也非絕對沒有可能性的。何況在南方的中國，因為和外國的接觸較密，而受西洋民族的侵畧較甚，民族主義之由此而發生，也是很自然的。總而言之，我們本不把民族革命來做太平天國的崛起的主因，假使民族革命而在太平天國的政治運動上，佔了相當的位置，那麼這種民族的革命，仍然和西方的文化輸入上，有了連帶的關係。

所以從文化的觀點來看：太平天國之和當時的政府相對抗，可以說是已從南方輸入，而且在南方發展的西洋文化和中國的因襲固有的文化相對抗。這一點我們可以把曾國藩咸豐四年所頒佈的討粵匪檄文來解釋：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叙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上隸兵卒賊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已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

以先世爲有名的孔孟學者一個少年登科第的曾國藩爲中國的固有

的文化辯護，是很自然而然的。其實曾氏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縮影；反之三次考試不錄，而憤恨的去崇奉西教的洪秀全之極力誣毀孔孟，極力抗反中國固有文化，極力去提倡西洋文化，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可是最巧妙的就是國藩以一位純正的中國文化的代表者，而結果却成爲人所目爲中國近代的西化運動的先驅。而秀全以一位提倡西化最力的人，結果也會反去提倡科舉，勸讀孔孟之書。我們以爲假使國藩仍是真實的不「竊外夷之緒」，秀全而始終反對孔孟之言，那麼太平天國和湘軍的成敗，恰成相反，也未可知？原來國藩之所以能夠得到最後勝利，並非像他檄文中所說的極力提倡孔孟之道而博取國人之心，他之所以勝利，不外是得力於「外夷之緒」如新式兵砲，如戈登將軍，和西洋人其他一切的幫助，反之秀全之終歸於失敗，與其說是由於崇奉洋教，採納西法，不如說是對於洋教和西法的不能澈底的施行應用。他們一到武昌，往日之所謂西化的精神，已逐漸頹靡，再到南京，則消滅殆盡。開科崇孔，貪功耽樂，均是復返中國傳統的文化的路，就使沒有國藩，自己也許逐漸腐化而致滅亡。

太平天國的失敗，固是由於自身的腐敗，然而他之對於新政策施行上，却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的注意。

在經濟方面，他們所欲實現者，是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從一八五三年的土地法令裡，我們找到下面一段話：

「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歲，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荳芋麻布棉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

穀數於薄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五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聖書及真詔旨書焉。」

其次他們對於婦女方面的解放，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放一異彩，就是在世界的婦女運動史上，也可以說是時代的先驅。在剷除惡習上，他們禁止婦女纏足，禁止婦女當娼，禁止納妾，在教育和職業上，他們給與婦女和男人同等的機會，在考試上，女也有女科，他們拔取參加女科考試的傅善祥爲第一，是因爲她力闢「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的經訓。此外在政治軍事上婦女也有同樣的利權，女丞相和女軍職均有設備，據說當時有女官六千五百八十四人，而女兵也有三十萬人。

此外對於奴隸的禁止，刑法的改善，白話文的提倡等，均是新政中之最可注意的。

又如在外交上他們因爲在香港各處與外人接觸較多，而且因爲以宗教爲政治運動的中心，故國際間的平等對待條約上的遵守，以及戰時的公法與中立法的应用，據林利的太平天國外紀，比之西洋各國較爲公道。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戊戌維新運動：

要是太平天國的政治運動是鴉片戰爭的一種影響，那麼戊戌維新運動，可以說是甲午中日之戰的反响。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裏說道：

(卷七頁一)

「喚起支那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支那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爲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彼奴隸者，苟抗顏而干預主人之家事，主人必慨然而怒，非擯斥則譴責耳。故奴隸於主人之事，罕有關心者，非其性然，勢使之然也。支那之人視國事若於己無與焉，雖經國恥歷國難，而漠然不以動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勢使然也。且其地太遼濶，而道路不通，彼此隔絕，異省之民罕有交通之事，其相視若異國焉，各不相知，各不相關，誠有如小說家所記巨鯨之體，廣袤數里，漁人斲其背而穴焉，寢處於是，炊爨於是，而巨鯨渺然不知也，故非受巨創負深痛，固不足以震動之。昔日本當安政間受浦賀艦一言之挫辱，而國民譁起，遂成維新。支那則一經庚申圓明園之變，再經申馬江之變，而十八行省之民，猶不知痛癢，未嘗稍改其頑固驕張之習，直待台灣既割，二百兆之償款既輸，而鼾睡之聲，乃漸驚起，此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戊戌維新運動的起因，既是由於受挫於方事努力於西洋化的日本，而這次運動的中堅人物，却是廣東的康有爲。康氏之所以從事於維新運動的背景，據梁啓超的康有爲傳裡有下面一段話：

「其時(康氏三十歲左右)西學初入中國，學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進步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各書盡讀之，彼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則別有會悟，能舉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開一境

界。」

這是康有為後來在政治舞臺上活動的背景，他的上書請求變法，也是從這種激動而來。我們相信康氏所受這種激動，必定很為厲害，否則決不會以一介書生，布衣平民，伏闕上書，請求變法。所謂變法，據康氏的意見，不外是取法西洋，其所以要取法西洋，是一方面見得俄人蠶食東方的陰謀，一方面見得日本效法西化的效果。無奈那個時候的臣僚，不但以人微言輕，而目康氏為狂夫，而且所謂變法，已為他們聞所未聞而反對。直到乙未戰敗以後，康氏始再有赴京師，重張旗鼓的機會，這時恰為會試之年，各省舉人集於北京者以萬數千計，康氏及其弟子梁啟超，趁了這個機會，創議由各省舉人署名上書請求變法，結果先由廣東湖南的舉人們署名，然後各省影響，從此開近代學者參加政治的先河，這就是後人所說的「公車上書」。公車上書是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間，至四月五月，有為一再上書，然終因大臣的嫉妬，而未得達。康氏不得已南行回粵，直到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佔據膠州灣，康氏乃再由粵到北京再上書陳請變法，這一次的上書，始得光緒覽閱，而康氏此後也逐漸見用。他所著述的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考均為光緒命令進呈，於是光緒始決定變法。這一次的維新運動，因守舊派的勢力太大，而致有政變的發生。故若照其政策的實施方面來說，無大可紀，然若照其在歷史上的重要方面來看，當然不能忽視。我們以為設使沒有這次的維新運動，那麼此後的革命運動的「成功」，也許沒有這麼快。設使這次的維新運動而能成功，那麼革命運動也許不會發展，至少也不會成功這麼快。不但這樣，此後八國聯軍之入京，也和維新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維新運動之有否，以及其成敗，在中國的歷史上，的確是一件極重要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有時也會相信以家傳理學，世尊孔孟，而同時又未出

國門一步，未懂外國言語的康有爲來提倡西法，也許會因「來源淺薄易竭，」而不能提倡澈底的西化，所以就使康氏能夠成功，於中國前途也許不會大有裨益，大有補救。試看他之尊崇孔教，以及出國以後，日趨於守舊復古，就能相信我們這些意料，也許是對的。然像康氏這樣的人，而能大聲疾呼提倡西化，委實是不容易找出來。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的中國的維新中堅人物，恐怕除了曾經直接受過西化的陶冶像容純甫嚴又陵外，要算康有爲了。

康氏的維新計畫，大都可以從他的著作，而尤其是他的奏稿中見之。然他的意見，中國若想自存，一定要變法，而所謂變法，就是變中國的舊法，而仿效西洋的新法。他見到中國和西洋的政治是很差異的。中國之所以失敗所以積弱，是由於中法的不合時宜，歐美之所以強勝，是由於西法的善良。且看他說：

「竊自東事敗後，近者膠旅繼割，國勢凌夷，瓜分日聞，幾不國矣。所以至於此者，一統閉關之治，與列強競爭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陸舟車之異宜也。今吾國處競爭之新世而行閉關之舊法，安能不危敗乎？夫秋扇必捐，堂簣無用；五月之裘難披，岸上之船不住，物之公理也。……逆天不祥，違時必敗。若當變不變，必有代變之者矣，與其人爲變之，何如自己變之爲安適夫？印度者人代變者也，日本者自己變者也，得失之故，可以鑒矣。（請告天祖誓群臣以變法定國是摺）

變法是應該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具體的變法，要從何處着手呢？康氏在請廢八股摺裡說：

「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於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於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莫先於廢八股矣。」

康氏極陳八股的弊病，以爲中國之割地敗兵，皆是八股有以致之。故此摺上去後，不久，光緒乃下詔廢除八股，八股既廢，他又請求開設學校。在他的請開學校摺裡他說：

「竊臣以狂愚請廢八股，荷蒙聖明嘉納，立下明詔施行，薄海迴風，洗濯固陋，咸更新厲學以贊休明。夫以千年之弊俗，而一旦掃除之，非皇上之神武英斷，何能致此。……雖然，譬諸治病，既以吐下而去其宿疴，卽宜急補養以培其中氣，則今者廣開學校，爲最要矣。」

這書上後，光緒也下詔諭各省府廳州縣，設立學校，此外他又上疏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請廣譯日本書，派遣遊學，在後者裡說：

「學者所事，學八股試帖，讀四書五經而外，無他學矣。其號稱博學方聞之士，則有義理，考據，掌故，詞章，輿地，金石諸學，通之者郡縣寡得其人，然問以新世五洲之輿地，國土，政教，藝俗，蓋皆茫然無睹，瞪目擡舌，若罔聞知。猝以投之大地，交通萬國之世，以當各國之新法新學新器，安有不敗者哉？蓋人才之盲瞽，不足用也。數千年閉關自足使然也，吾永永閉關，以爲今之世，猶古之世也。……吾今自救之圖，豈有異術哉，亦亟變法，亟派游學歐美之政治工藝，文學，知識，大譯其書，以善其治，則以吾國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強，可倍速過于日本也。」

然而所謂效法歐美者，大都是間接的效法，所謂間接，就是主張派留學生赴日本，而其理由是：

「譯歐美之書，其途至難，成書至少。臣愚顛顛思之，以爲日本我同文也，其變法至今三十年，凡歐美政治，文學，武備，

新識之佳書咸譯矣：，但工藝少闕，不如歐美耳，譯日本之書爲我文字者，十之八，其費事至少，其費日無多也。」

他又說：

「大抵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

本來這種不澈底的西化，就使當時能夠實行，未必能得良果，何況庚子以後，張之洞劉坤一等大臣，對於這些條陳，多能使其實現，而其結果，不但沒有多大效益，而且養成三十年來的徒學皮毛的弊病。然而以康氏這樣沒有西學根底的人，而能夠極力提倡西化，也是不容易找出來的；而且在當時的人們看去，委實是超過時代的見解呵。

上面所說者，是教育的維新，因爲康氏覺得教育特別重要，所以也可以說這是變法的張本。至於政體方面，他所主張的是君主立憲，在請定立憲開國會摺裡說：

「臣竊聞東西各國之強，皆以立憲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蓋自三權鼎立之說出，以國會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總之，立定憲法，同受治焉。人主尊爲神聖，不受責任，而政府代之；東西各國，皆行此政體，故人君與千百萬之國民，合爲一體，國安得不強。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于數人者，自然之數也。」

此外他又組織戒纏足會，並上疏請求禁婦女裹足，而其理由是：

「古今中外，未有惡俗苦體，非關功令，乃能淹被天下，流傳千年，若斯之甚也；其可駭，莫甚焉。以國之政治論，則濫無辜之非刑；以家之慈恩論，則傷父母之仁愛；以人之衛生論，

則折骨無用之致疾；以兵之競強論，則弱種展轉之謬傳；以俗之美觀論，則野蠻貽誚於鄰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其尤爲激烈的條陳，是主張斷髮易服，且看他說長髮之害。

「且今物質修明，尤尙機器，辮髮長垂，行動搖舞，誤纏機器，可以立死。今爲機器之世，多機器則強，少機器則弱，辮髮與機器不相容者也。且兵爭之世，執戈跨馬，辮尤不便，其勢不能不去之。」

他又舉出歐美人百數十年前，皆是辮髮，因爲機器的發達，故通通剪除。並且辮髮於衛生殊爲不合，而中國人之在外國者，又爲外人目爲豚尾，於國體面子，均不好看。所以日本俄羅斯之變法，皆以斷髮爲急務。其原因也不外是「改民觀聽，導民尙武，與歐美同俗，而習忘之」。至於易服的理由，可於下面一段話中見之。

「今則萬國交通，一切趨於尙同，而吾以一國衣服獨異，則情意不親，邦交不結矣。……以數千年一統儒緩之中國，褻衣博帶，長裾雅步，而施之萬國競爭之世，亦猶佩玉鳴琚，以走趨救火也，誠非所宜矣。」

他又以爲趙武靈王之所以能勝胡人，是由於變服而騎，齊桓公之所以能稱霸，是由於更易短衣；因此他極力主張採用西服。總之，我們詳細的考研康氏的著作言論，無一不以歐美爲鵠的。連他之主張尊孔教爲國教，也是想以西洋人之崇奉其教之方法以崇奉孔子。所以他說：

「夫小民智者少而愚者多，勢必巫覡爲政，妄立淫祀，崇拜神怪，乃自然之數矣。積世既久，方將敬奉之不暇，孰敢與爭；于是淫祠遍地，餘波普蕩，妖廟繁立于海外，重爲歐美所怪笑，以爲無教之國民，豈不恥哉。然旋觀歐美之民，祈禱必於天

神，廟祀只于教主；七日齋潔膜拜，誦其教經，稱于神名，起立恭默，雅琴合奏，一唱三嘆，警其天良，起其齋肅，此真得神教之意，而又不失尊敬之心。」

上面所說的各種計畫或見解，大都是康氏所欲立即實現者；而且事實上，也有多少已經實現。至於康氏的理想世界之解釋最詳者，要算他的大同書。據梁任公的話，康氏著此書時，乃自出心裁，一無依傍，一無勦襲。然事實上細心閱過此書的人，恐怕不會相信梁先生的話罷。